

红 色 风 暴 丛 书

刘 俊 秀 著

艰难的历程

(下)

艰 难 的 历 程

(下)

刘 俊 秀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南昌

红色风暴丛书

艰 难 的 历 程 (下)

刘俊秀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4.375 字数12万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统一书号: 10110·243 定价: 0.43元

《红色风暴丛书》书目

回忆长征中的周恩来同志

和董必武同志在一起

红九军团在长征中

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忆少先队和少共国际师

井冈山赤卫队员

“蛮牯佬”从军记

高举红旗 坚持斗争

——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艰难的历程（上、下）

目 录

开辟晋西北	(1)
“那里是十分艰苦的”	(2)
一个混乱而复杂的地方	(5)
开头的几脚	(9)
扩军筹粮	(15)
特殊答案	(21)
党员、秘密党员和特别党员	(28)
粉碎阎锡山的“十二月事变”	(36)
新的困难与“四大动员”	(51)
在“九路围攻”的日子里	(59)
“四大动员”的是与非	(65)
饥饿的1940年	(70)
婚姻和家庭	(76)
回延安	(82)
洗脸照镜	(82)
边打锣鼓边出鬼	(86)
工农干部的必经之路	(90)
在“七大”期间	(92)
南下第一仗	(96)
掉头东向	(99)
战吉林	(102)
全歼吉林“地下军”	(103)

官马山的反奸清算斗争.....	(106)
黑林镇“攻坚”	(111)
又一个转折.....	(117)
在暴风骤雨之中.....	(120)
“搬石头”的风波.....	(127)
万里长征又从头.....	(132)

开辟晋西北

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八个月，收获是不小的。思想上更充实了，身体也逐渐好起来。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吃的是小米粥、小米饭、白水煮白菜，但是，比起长征路上吃草根、嚼皮带，比起过祁连山含着冰块行军，简直有点象神仙过的日子了。

然而，我常常感到生活里缺少了点什么，心里时不时地觉得忐忑不安。我丢失了什么吗？没有呀！可以称之为是我的“财产”的，只有一支手枪和几十发子弹。我把枪擦了又擦，零件齐全；把子弹数了又数，一颗不少。在和一些长征过来的同志的交谈中，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有这种心情。什么原因呢？我仔细想了想，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一个多年来生活在激烈的战斗中的战士，突然转入比较安静的环境，那是很难适应的，特别是当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

过了1938年元旦，我再也坐不下去了。

当时，抗日战争进行了将近半年。头年九、十月间，我八路军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共三万多人，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东渡黄河，杀上了华北抗日前线，并且取得了平型关、雁北、忻口几个战役的辉煌胜利，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必胜的信心。我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抗日，不得不与日军作战。这都是令人鼓舞的方面。但是，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央军”节节败退。数月之间，北平、天津接连失守，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在山西，阎锡山的军队欺侮老百姓很有本事，在日寇面前却不堪一击，失了大同，又丢了太原。就在这时，听了毛主席的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严肃地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

进入主要地位。”显然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担子，已沉沉地压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了。去年年底，党中央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庄严宣告，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号召全国人民“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烽火连天，炮声震地，军号频催，一个真正的战士，能不持枪而起吗？

于是，我决定向中央写报告，请求上前线。

既然要求上前线，那么到哪里合适呢？我想回湘赣省。因为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日寇正在向长江流域进攻，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是不能持久的。这样，战火势必向南蔓延，燃到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如果能让我回到我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我甚至可以把开展工作的计划和请示报告同时送给中央。

正当我草拟报告的时候，校部通知我：“陈云同志来电话，请你去一趟。”我立刻认定陈云是找我谈工作的，便立即朝中央组织部奔去。

“那里是十分艰苦的”

我径直奔进陈云的办公室里。他看见我，立即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热情地请我坐下，给我倒茶，然后关切地问道：“俊秀同志，身体好些了吗？”

“完全好了，陈云同志。”我回答说。

他点点头，微笑着，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番，似乎在看我是不是真的恢复了健康。

“你看——”我使劲地弯曲两肘，又伸直胳膊，“又可以三天不吃饭，含着冰块行军作战了。把我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吧！”

“弼时同志对我说过，你善于在恶劣的环境里打开局面。”他说着，看了我一眼，问道，“你好象有什么打算吧，俊秀同志？”

既然心思被他看破了，我就坦率地、毫无拘束地谈了自己的思

想活动。

“想回湘赣一带？好，我记下了。不过，目前迫切需要人的地方，是华北，特别是晋西北，你看——”他站起来指着屋里的挂图继续对我说“晋西北和我们陕北紧紧挨在一起，中间只隔了一道黄河。如果我们在晋西北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就给陕北筑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为华北抗战建起一座强有力的堡垒；并且也是在华北前线和陕甘宁边区之间架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开创的一个战略要地，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我点点头，表示领会了他的意思。

“去年十月，贺龙、关向应和甘泗淇，已经率领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他们一边和日军作战，一边做了许多工作。为了尽快地把这块根据地建立起来，中央决定成立晋绥临时省委，由你担任组织部长。马林、赵林和罗贵波已经在岢岚。你立即带一批干部到晋西北去，着手开辟工作。”他顿了一下，笑笑说，“你想南下，我却让你北上，和你的想法大不一样呀，有意见没有？”

“我服从组织分配。”对于工作，我从来没有讲过价钱。不过心里还在想，到晋西北终究不如到南方参加战斗过瘾。

“那好，先工作两年看看。”说到此，他意味深长地朝我笑笑，继续说，“你可别以为那里很容易开辟。那里生活贫困，斗争复杂、激烈，工作将会是十分艰苦的。”

“干三年再说吧。”我说。心想，你可真把我的思想摸透了。

从陈云那里出来后，我兴奋不已。我走在延安的土路上，一颗心早飞到晋西北了。只是几十个干部要办理必要的手续，作一些行军准备，总得耽搁一下。趁这个机会，我看望了几个老战友，并且到任弼时那里向他告辞。在战争环境里，一别几年是常事，十年八载难见一面也不奇怪；而一旦战死沙场，便是永诀。所以同志们在分别时常说“希望你活着回来”；乍一相见则总是兴奋地给对方一拳：“好家伙，你还活着？”为了革命事业，大家都把生死置于度外，而同志间的可贵情谊，是至死也不会忘记的。

弼时知道我要去前线。他的工作特忙，我本想告诉他一声就走，可是他却要我坐下来。他给我一支烟，自己吸着烟斗。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

“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你很坚决，也很有办法，中央是信赖你的。”他开门见山地说，“你要认真考虑的是，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我们和国民党、阎锡山结成了统一战线，这对于抗日战争、对于党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有利的，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们必须维护它、巩固它、发展它。但是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接着，弼时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说，日本人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毫无疑问的。蒋介石呢，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硬把他推上抗日的道路的，他勉强得很，随时都可能发生动摇。而阎锡山，则是一只老狐狸，玩的是狡兔三窟的把戏。他和日本人暗中勾搭，准备了一条投降的路；但目前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贸然投降。他要依靠蒋介石，但又不敢过分依靠。因为他吃过蒋介石的亏，害怕丢了山西这块地盘；他想借我们的力量来壮大他自己的势力，但又害怕群众发动起来了，不听他的使唤。我们要抗日，蒋、阎也抗日，这是我们一致的地方，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日、蒋、阎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这是我们必须提防的。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利用，使之有利于抗日。总之，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山西则集中了所有这些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策略上必须机动、灵活，以求得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而在原则问题上，则必须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变成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了。

紧接着，弼时问我听过《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这个报告没有。“毛主席的这个报告，是我们党在抗日时期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毛主席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在全国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这不是无的放矢的。俊秀同志，我们党里有些人‘左’起来‘左’得要命，右起来又右得惊人。”他有些激动地站起来，踱着步：“有人说，我们一切都要‘经

过’统一战线，一切都要‘服从’统一战线。那要我们党干什么？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怪事！当然，象你们这些经过大革命考验的老党员，是能够辨别是非、坚持原则的，因为你们有过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吃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亏。这种血的教训，全党都应该永远记取，特别是在今天。”

弼时还告诉我，马林和赵林富有白区斗争的经验，罗贵波的军事斗争经验是很丰富的。要互相取长补短，团结共事，尽快地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和发展起来。临走，弼时送我到窑洞门口，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遇到重大问题，要请示华北局，请示中央。但是，在目前的战争环境里、复杂的斗争中，情况瞬息万变，许多问题，不可能等待中央决定之后再作。这就要根据党的指导思想，独立地思考、判断，果敢地作出决定。在苏区时期那种大胆、泼辣的作风，应该继续发扬。中央对你、对晋绥临时省委的同志，是完全信任的。”

一个混乱而复杂的地方

三天之后，我带着一支由六十余人组成的干部队伍，告别延安，向晋西北进发。我们取道延长、清涧、绥德、米脂和葭县，从兴县附近的黑峪口东渡黄河，然后直奔岢岚。

一路之上，大雪纷飞，积雪盈尺，北风刀子似地割肌刺骨。在这样的雪天行军，艰苦得很，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特别是顶风上山的时候，怒号的北风似乎要把人推下来。但是，由于大家情绪高昂，狂风暴雪不但没有延缓我们的行程，反而加快了我们的行程。有的同志甚至登上山巅，朗诵起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写的咏雪诗来。当读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时候，我们这六十儿人一个个都热血沸腾。这些同志大都是在陕北本地成长起来的年轻红军干部，出身工农，吃惯了苦；个别知识分子出身的，经过这些年残酷战争的考验，也多半工农化了。所以，对于这一路风

雪，谁也不在意。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刚从边区党校结业，象我一样，早就盼着上前线，迎接新的斗争、新的胜利。心急如火，风雪岂能阻挡？因此我们晓行夜宿，一刻也没有耽搁，一月十天左右，便到达了晋西北的政治中心——岢岚。

晋绥临时省委书记马林、宣传部长赵林和武装部长罗贵波等知道我们要来，已在岢岚等候多时。当晚，我们四人就在一二〇师驻岢岚办事处开了第一次省委会。那时候，因为阎锡山采取“联共反共”的两面政策，所以我们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是秘密的。省委公开的活动场所就是这个办事处。罗贵波任一二〇师驻岢岚办事处主任，我的公开身份是办事处组织科长，赵林为宣传科长。我和这几位同志都是首次相识。马林是山西保德人，内战时期做秘密工作时被捕，不久前才出狱；赵林是江西吉安人，也在白区做秘密工作时被捕，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由刘少奇、薄一波从山西监狱营救出来。他们两人都是知识分子，理论水平较高，并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特别是在敌人的监狱中，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可能是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吧，他们的性格都比较沉静，慎审寡言。至于罗贵波，在江西苏区时期就当过红军军政委，是个文武全才。因为我们目标一致，休戚相关，所以大家一见如故，好似战友重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届省委（1938年8月以后改为晋西北区党委）是个经得起考验的、团结战斗的集体。直到现在，我仍然怀念当年那种相互披肝沥胆、没有私人芥蒂的同志情谊。

当时，我把六十几名干部的情况作了汇报；马林、赵林和罗贵波也向我介绍了晋西北的现状。尔后，我又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对这个区域的混乱局面，才算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我们所说的晋西北，指的是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南、汾离公路以北这么一片土地，并包括平绥铁路以北的雁北和大青山地区。面积为山西的五分之一，包括三十三个县的范围，人口约三百万。地方是不小的，人口比陕甘宁边区还要多。但是，

省委才成立时，只有很少几个县、区在我们手里。头年十月，当我一二〇师进入山西时，大同已经失守，太原也相继沦陷，日寇长驱直入，陆续占领了神池、宁武、原平、崞县、忻县等晋西北的腹地县份。“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除了在八路军配合之下，打了个忻口战役外，几乎没有作什么象样的抵抗。只有当时还很弱小的决死队、工卫旅和几个小游击队，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战斗。因此，国民党的军队溃退、政权垮台、官吏逃亡，一塌糊涂。是我一二〇师力挽狂澜，派出数十个工作团，深入敌占区，动员与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且在敌后和敌人的侧背，进行了殊死搏斗，经过大小数十战，才逐渐收复了失地，摧毁了敌伪汉奸政权，挽救了战局，克服了危机。

然而，这时的一切仍是十分复杂、混乱不堪的。

首先，政权还在阎锡山手里。阎锡山那些腐败官吏，除了抽大烟、刮地皮，是一无所能的。他们还没看到敌人的影子便逃之夭夭。待八路军赶走了敌人，他们却飞快地跑回来，继续对人民施行压迫和剥削。这就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妨碍了我们的动员工作。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我们既不能任意撤换他们，也不能重新派人代替。这可真是一大难题啊。

第二，溃军如蚁，社会不宁。八路军一把鬼子赶走，各种牌号的溃军便蜂涌而出。除了阎锡山的军队外，还有马占山的东北军、傅作义的绥远军、何柱国的“中央军”、由土匪组成并为阎锡山收编的“游击三师”，以及以种种名目出现的散兵游勇。这些人在鬼子面前胆小如鼠，见了老百姓却强横霸道、胡作非为。他们在哪里出现，哪里便鸡飞狗跳，百姓遭殃。我们不好用武力消灭他们——因为他们也打着“抗日”的牌子；而跟他们讲道理，即使不说等于对牛弹琴，也是收效甚微。这也是当时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第三，抗日民众团体很不健全。当时，虽然有几个县建立了“牺盟会”、“战动会”，但因为晋西北是山西的偏远地区，它们建立的时间又很短，加上汉奸和“公道团”顽固分子的破坏，所以

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开展工作，也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于其它抗日团体，则多半只空挂个牌子，徒有其名。

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由于阎锡山奉行“存在主义”反动哲学，坚持“抗日和日”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长期坚持防共反共政策，因此在日寇铁蹄踏进晋西北以前，他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抗战动员工作。在我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虽然进行了一些抗日宣传，但也处处受到他们的阻挠。他们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谁要去动员民众，他们就认为这是“共产”、“赤化”，就要予以取缔、镇压。所以，许多群众还存在“谁来坐天下都要完粮纳税”的模糊观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同时，晋西北的自然条件不大好，土地比较贫瘠，无霜期很短，只有小米、莜麦、山药蛋、羊毛、羊皮几种出产，人民生活本来就 very 苦。加之阎锡山的苛捐杂税、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日寇的蹂躏、溃兵的抢劫，便更把群众推到了死亡线上。所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是刻不容缓的。

同蒲线上的鬼子，正在准备再次进行大规模进攻；汉奸维持会在暗中破坏，山西投降派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而在我晋西北这块土地上，却又问题成堆，错综复杂。这就是我们当时面对的现实。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着手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且要尽快地建立起来。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省委对当时敌友我三方的情况作了全面分析，认为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有陕甘宁边区作后盾，有一二〇师作支柱，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干部作骨干，加之我们党过去在这个地区并非完全没有影响，所以主观条件是有利的。虽然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但一定会不断发展、不断壮大。至于我们的敌人，他们武器装备精良、军队训练有素、富于战斗力，而且野蛮、残忍，当然比白军难打些；但他们毕竟是入侵我国的民族敌人，地利、人和都为我们所有，从这个角度上说，又比白军好打。而友方呢？我们和蒋介石、阎锡山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从抗日这个整体利益出发，我们不得

不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不得受他们的种种限制，使我们不能象在苏区时期那样，可以放开手脚；但是，我们取得了合法地位，有了一个立足点，只要我们大胆工作，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就可以争取主动，控制局面，推进和发展晋西北的抗日形势。

开头的几脚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我们整个工作的思想依据。为了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我们党把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下，并使全部政策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每一项统战政策，这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就必须进行抗日，就是“蒋委员长”、“阎司令长官”也得服从这个总的目标。因此，凡是有利于抗日的工作，符合统战原则，他们赞成也好，反对也好，我们都要坚决地去做，不能受他们的限制和束缚。

同蒲、平绥线上的日寇，正虎视眈眈地对着晋西北，敌人大规模的进攻临近了。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放在战争这个基本点上。战争，会使我们遭受严重的破坏，经受极大的困难，也将给我们以开展工作的有利时机。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并且赢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在整个春季，从日寇二月间的大举进犯到一二〇师于三月底把敌人赶走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工作。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区党委召集了各种会议，决定把新老干部以及各抗日群众团体、青年学生组成工作团和工作队，撒向全区广大农村。我们首先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动员，提高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的必胜信心。我们用八路军的历次重大胜利、地方游击队的突出战绩来教育群众。日寇的残酷烧杀、奸淫掳掠，土匪溃兵抢劫捣乱、欺压百姓，也是我们经常利用的反面教材。群众深受日寇、溃兵之害，抗日积极性很快被调

动起来了，迫切希望“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把溃兵土匪清出去”。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还必须使群众得到实际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为此，我们不失时机地宣传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实行人民民主。在经济上，我们提出了“废除苛捐杂税，开展减租减息”的口号。群众热烈拥护我们的主张，信任我们，表示要跟共产党走，于是也就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民先队、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把群众组织起来。又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了规模不同的抗日游击队。群众不再是“一盘散沙”了。在日寇来犯的时候，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投入抗敌斗争，有力地配合八路军作战，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我们随即着手建立县、区、乡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初在苏区的时候，只要我们占据了一块地方，便彻底摧毁当地一切旧的国家机器，逐级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可是，现在这个政权是阎锡山的，我们既不能摧毁它，又不能重新建立一套平行的政府。如果它能抗日，我们还可以加以改造和利用，可恶的是它不仅不抗日，反而是我们进行抗日的障碍。它的那些官吏，除了极少数人外，都只会欺压老百姓、弃城而逃，甚至投敌当汉奸。共产党员当县长的，真是凤毛麟角。在晋西北区，我记得，开始只有文水县长顾永田、兴县县长张干承二人是党员。那么，怎样才能既把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来，又不授人以柄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解决了。

早在头年十一月日寇进犯晋西北时，交城、汾阳一带十数县的县长及其僚属，便逃得无踪无影。当我一二〇师到达这个地区的时候，支撑这里抗日局面的，只有我们党领导下的“战动会”、“牺盟会”和它组织的一些青年学生。此时，周恩来路经汾阳，了解了这个情况，便对南汉宸等说：“县长跑了，问阎锡山要去嘛。这个时候，他是派不出来的；即使想派，也没人敢来。那么，你就问

他，我们推选一个行不行？一个县没有县长，怎么抗日呀。”不两天，国民党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兵退汾阳，找县政府要给养，可县政府空无一人。万余人没饭吃，卫立煌急得拍桌子骂娘。“战动会”汾阳办事处刘范栋、王廷弼、武人骥等便决定把政府收集的粮食拨给他们几百担。因为卫立煌虽然反动，士兵们总还是要抗日的，饭应该给吃；再则，那些士兵饿急了，一旦放抢，还是老百姓遭殃。所以，当即派武人骥以“战动会”和青年代表的名义，去“欢迎”和“慰问”卫立煌部，并答应给几百担面粉。卫立煌顿时眉开眼笑，说了汾阳抗日青年一大堆好话，又把那些逃跑的县长臭骂了一通。武人骥趁机提出：“县长擅自弃城离职，对战机军机贻误甚大。如果有县长坚持职守，出面接应，这次也不致于使贵军为粮食着急了。我们希望卫副司令转告阎长官，请他迅速派县长来；如果有困难，是否可以让抗日民众民主推选。”卫立煌立即满口答应。第二天，他便告诉“战动会”，说已和阎锡山联系好了，由你们自己推选出县长。于是，常芝青、顾永田、武人骥便分别当了交城、文水和汾阳的县长。

虽然后来阎锡山翻脸不认帐，说“没有我的委任状，不算。”甚至还要抓武人骥。但是，这仍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斗争方法。所以，当二、三月日寇侵占宁武、神池一带，几个县长相继逃跑时，我们再次采用这个办法，由“牺盟会”出面，向阎锡山“推荐”了几个县长，并且得到了“任命书”。对于那些勾结敌人、当了汉奸的，我们掌握了充分证据之后，报告阎锡山，他也不得不撤换。

尽管如此，当时晋西北大多数县的县长还仍由阎锡山的腐朽官僚充任。我们一时无法调换他们，而阎锡山也深知印把子的重要，死死抓住不放。可是，我们的抗日工作，却一分钟也不能等待。怎么办呢？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战动会”，用它行使抗日政权的主要职能。

“战动会”的全称是“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